

南昌起义前夕

—九江庐山会议史探选编

中共九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南昌起义前夕

——九江庐山会议史探选编

(赣北党史资料)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九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七月

前 言

南昌起义打响了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是党史军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有关南昌起义史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在各级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和参加起义的老同志以及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各人掌握的史料不全，占有材料各异，特别是对南昌起义前夕党在九江、庐山活动情况了解有限，有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大一致。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张侠同志的建议，举办了南昌起义前夕有关史料的《笔谈会》，得到了全国各地许多专家、教授和学者热情的支持，他们以各自掌握的史料为依据，进行了认真的、深入的探讨，给我们撰写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现从来文中选择几篇不同见解的文章，连同几篇有关南昌起义历史文献节录和部分老同志回忆材料，汇编成册，供有关领导、党史部门、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工作者参考。其他同志来文，我们亦作资料存查，恕未一一刊出，谨致歉意。有些参加起义的老同志，虽没有为我们《笔谈会》撰写文章，但他们热情接待了我办赴京、沪访问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我们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史研究工作者提出批评，不吝赐教。

中共九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 录

前 言

笔谈会文章

九江、庐山在南昌起义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 张 侠 (1)

关于南昌起义决定之我见

……北京师范大学 金再及 (18)

关于南昌起义的提出和决定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王年一 (24)

对南昌起义决策过程的考察

……南京大学历史系 姜 平 (35)

南昌起义决定阶段的九江与庐山

……庐山旅游公司 罗时叙 (58)

附 录

南昌起义资料 (节录)

“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张太雷 (87)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一九二七年十月)
……李立三 (89)

关于南昌起义问题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周逸群 (92)

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 ……叶 挺 (94)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吴玉章 (100)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一段回忆 ……朱蕴山 (104)

从武汉到潮汕 ……黄 霖 (108)

笔 谈 会 文 章

九江、庐山在南昌起义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 张 侠

南昌起义前夕，我党在九江与庐山召开了几次会议，这些会议对发动南昌起义起过伟大的作用；我党所能控制的军队，在起义发动前，几乎全部集结在九江地区。然后，折向南昌，因而，九江地区成了我们发动南昌起义的前进基地；我党大批党员和负责同志，在中央于武汉作出了要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之后，纷纷集结九江，他们在九江进行了大量工作之后，转向南昌；我党干部和所控制的军队，所以集结九江，这又是和九江的战略地位分不开的。九江口，是军事重镇，又是历史名城，两千年来，它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党控制的军队，能以顺利集结于九江，这对发动南昌起义是有着极其重大作用的。

我 军 集 结 九 江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下旬，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全部集结于九江地区，其中有第四军的原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编成的二十五师；有第十一军的也是以叶挺独立团为部分基础并由叶挺所统率的二十四师；有贺龙的二十军。也还有一些预定要参加起义但种种原因却没有参加得上的其他一些部队。

什么原因使这些部队都能顺利集结九江，从而造成得以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条件呢？

这就得以“东征讨蒋”说起。

一九二七年的六、七月份，“东征讨蒋”的口号叫得很响。而且，大家都叫。

有的说“东征讨蒋”是假的没这回事。还有的说，“东征讨蒋”是敌人的口号，我们利用了这个口号，从而把我们所能控制的军队调集到九江地区。

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或不全对。以前者论，“东征讨蒋”口号并不假，而且，很热闹过一阵子；以后者论，我们难以利用这个口号来调集部队。兵权不在我手，军令不由我发，军队不由我调，就连我党控制的某些师或团，也不能说完全调得动。总之，不论你利用什么口号，军队是调不动的。把这些军队调到九江，是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这些人的事，是按着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命令集结于九江的。所不同的一点是“东征讨蒋”，集结九江，是我们所赞成的。

现在，让我们引几则材料加以阐发。

材料之一，当时极端报露过这样的消息：

“武汉军事委员会对讨蒋介石之军事行动同时积极进行，由张发奎、朱辉日、朱培德、贺龙各部合组之东征军集中江西，分（一）由九江、湖口向安庆；（二）由赣东攻浙江；（三）由鄂东赴皖北之三路进行。蒋系驻皖之王普、夏斗寅电南京告急。”（上海历史研究所《一九二七年国内外大事纪》）

从这一消息看，武汉对南京是想干一下子的。

材料之二，李宗仁回忆说：

我本人昼夜南下，于七月初抵南京。至是，我才知武汉军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我军如不克日回师，则后防可虑。”（《李宗仁回

忆录 >)

李宗仁后来很快回到徐州，布置调动军队，他的精锐第七军，很快调到“芜湖以西地区布防。”

除李宗仁第七军外，蒋介石还从津浦线抽调几支大军迫“湖口、九江”。报纸消息说，调集有“五万大军”。

从这些材料看，宁汉两方，剑拔弩张，大有非干不可之势。所以说，武汉方面的“东征讨蒋”口号，确有其事。

从汪精卫来说，他是想和蒋介石比高低的，他想反蒋介石，由他来驾登国民党的宝座。正如史沫特莱写的那样：“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政府开始与蒋介石威胁武汉的军队大唱双簧。汪精卫很想把共产党压制下去，把苏联顾问遣送回国，但始终认为蒋介石乃是暴发户，只有自己才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伟大的道路》）这说明汪精卫喊“东征讨蒋”口号，是不假的，起码是一箭双雕既想与蒋争雌雄，争不到雌也可以讨价还价；又借以在人民面前做做样子，捞点政治资本。

唐生智也高唱这个口号，他一方面要和蒋介石比高下，争“总司令”这一宝座，另一方面，想利用这个口号来消灭共产党。且看以下材料。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载有这样一段消息。

“第二次北伐时，唐生智对与共党有关系之军队，即已步步提防，饷械两项格外慎重，故领得七十万现金，仅予以五万余元；领得四百万子弹，仅予以七万。临颖战役，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以与共党有关之军队参加正面作战，致彼损失八千多之士兵。……对于在赣之共党军队（即第二十军队贺龙及第十一军叶挺一师），亦有根本解决之计划，即以东

征为号召，以贺、叶军队担任中路前锋，左路唐生智之第三十五军沿长江西岸前行，三十六军更紧随其后；右路为程潜之第六军及十三军；朱培德所部则在赣南集中，为断彼回粤之计。在（再）以左右两翼之力量，压迫彼去打硬仗。如胜利，则令其开赴江北，且饷械不予接济，则彼必归于自然消灭之一途。”

看，唐生智喊“东征讨蒋”是何居心？他想一箭三雕：支持了汪精卫，打击了张发奎，利用共产党去打老蒋；打垮了老蒋，一切胜利归唐，共产党自消自亡；打不垮老蒋，也两败俱伤，唐生智无恙。唐生智把我们贺叶所部，摆在九江这一“中路前锋”的地位，正是个首当其冲的地位，实际上是个陷阱。唐生智用心何其毒也。

贺、叶部队都属第二方面军，把第二方面军摆在这样一个打硬仗、啃硬骨头却没有什么油水的地位，作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是傻瓜吗？他看不出唐生智的这一阴谋吗？不，张发奎有他自己的算盘，他跟着汪精卫、唐生智喊“东征讨蒋”这个口号，而且，似乎唯命是从地把第二方面军全军集结在九江地区，这是他上了当吗？不，他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

郭沫若说过：

“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沫若文集》八）。

如此看来，张发奎也很聪明，九江是他心目中进退裕如

的理想转折点。这就是说，如果真要“东征讨蒋”，九江是个最好的进攻出发地，但如果是另一种，就成为他南返广东的转折点，也是最好的南进出发地了。

从以上材料看来，“东征讨蒋”，四字相同，而且，叫的都很响，但汪、唐、张各有各的主张；对九江这个战略要地，汪、唐、张虽然都很重视，但他们都是各自派了不同的用场。

那末，我们一方呢？可以这样说，真正主张“东征讨蒋”的，只有共产党；除共产党而外，没有第二者。

远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周恩来同志等人就写信党中央，主张“迅速出师，直指南京”，讨伐蒋介石；而且，即使到了七月的时候，虽然战机已经已失再失，但如果各方密切合作，全力东征，讨伐蒋介石，仍然不见得没有希望。退一步说，如不东征而改为“南旋”，即打回广东去，这也是我党早在武汉时就提出的主张，因而，如同张发奎那样，进驻九江，一旦有变，向右转弯，即可直指广东了。

从这些材料看，汪、唐、张、我四方，都拥护“东征讨蒋”的口号，又都一致同意向九江集结。就这样，各把各的目的藏在内心，在外表，一直高喊着“东征讨蒋”的口号，浩浩荡荡，兵发九江。

九江、庐山会议

九江会议的第一次会，当是七月二十日。这里的根据主要是叶挺和李立三两份报告。

叶挺在报告中说：

“至七月二十号左右，我们的军队因讨蒋的任务，集中九江者，约六团，张发奎已实行分共的政策，令我们著名的

同志退出C、P。此时我们的负责同志，因武汉形势险恶，多到九江。由谭平山召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有邓中夏、李立三、叶挺等，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叶挺《南昌暴动到潮汕的失败》，载《党史研究》1980、4月）

叶挺这一报告，写于南昌暴动后不久，时间近，记忆清，所以，九江第一次会议应该说大致是在七月二十日左右。

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说：“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南昌起义》资料选编）

从李立三这一文件中看出，他们这三个人（即叶挺上述报告中所指的除聂荣臻以外的三人）是十九日到九江的，虽然没有说会议日期，但提到了他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显然这是指的同一个人，而且，分析起来，十九日到九江，二十日举行会议，是可能的。

有的同志引用了李立三一九六〇年夏在庐山休养时的谈话，说是庐山会议是在“七月十九日”的并说明七月十九日还在九江开了一个会，会后即上山，又开了庐山会议。

九江会议与庐山会议都说成是七月十九日，又是七月十九日才由武汉到九江，这样，未免太急促。况且，叶挺的报告说是“七月二十日左右”，而没有说“七月十九日左右”。李立三报告中也说“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令到九江”，这个日子是很肯定的。

根据即如上，分析起来，九江第一次会议在七月二十日，比较合理。

九江第一次会议之后，由于瞿秋白和鲍罗庭都在庐山，

所以，李立三等人，就上山向瞿秋白去说说，从而出现了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地点，没有争论，大家一致认为“仙岩饭店”（当时叫“仙岩客寓”）。仙岩客寓（现为“五一”疗养院）是英国人开的，条件很高，房价昂贵，说是六元现洋一天。由于当时林伯渠的本家叔叔在该客寓当洋厨师（做西餐），所以，就在该客寓的厨房里开了这次会，李立三还记得点起蜡烛，为了隐蔽，就用厨师的围裙遮了一下窗子。

仙岩客寓，现为“五一”疗养院，房舍基本保留。

庐山会议的参加人，据罗时叙同志引李立三于一九六〇年回忆说是九个人，他们是：鲍罗庭、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林伯渠、叶挺、彭湃、聂荣臻、郭亮。

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聂老总对我说，他到九江之后，鲍罗庭正在庐山，他想了解南昌起义的准备情况，由张太雷邀我上庐山向他汇报，我上庐山后，把各部队的情况作了汇报。聂总还说，我在山上没有见到瞿秋白，只见到鲍罗庭。我汇报时是张太雷翻译。

聂总当时上山还有一个任务，他说（大意），恩来同志叫我把中央要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通知在山上养病的刘少奇。

杨尚昆同志也说，少奇同志住医生洼，……聂荣臻同志上山通知他党中央武装起义的决定，他都表示赞成。这个时候，听说汪精卫也要上山开反共会议，少奇同志……就搬到白鹿洞去了。（1966年4月30日参观八一馆时的谈话）

根据上述材料，聂总上庐山可能较晚，因为：一是没见到瞿秋白，这说明很可能是瞿已离开庐山回汉口了；二是听说了汪精卫要到庐山来；李立三报告中提到是在第二次九江

会议时才听说汪精卫要开反共会议的。

基于上述，庐山会议即有瞿秋白参加的仙岩客寓那次会
议，很可能是在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两日间。因为，据张国涛
说，瞿秋白是二十一日返抵汉口了。

这次会议，依聂总回忆，他没有见到瞿秋白，他在和鲍
罗庭谈话时，是张太雷翻译，而李立三所列庐山会议的九人
名单中，恰巧都没有张太雷，基此分析，第一次庐山会议，
聂荣臻、张太雷都没有参加；而第二次会议，即有他二人参
加的这次，则瞿秋白（已走）没有参加。

庐山会议之后，又举行了第二次九江会议。

李立三报告中说：

“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
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共产
党，同时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
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
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
时我尚在庐山，浔中、平、代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

这就是第二次九江会议。

第二次九江会议的时间，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也认为
各方面的依据也都不够，所以过早断定似为不妥。但有个上
下限是可以肯定的。根据李立三报告中说，张发奎尚未到
浔。“张发奎到浔”是二十九日晨，那末，下限要在二十九日
之前。李立三又说“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
晚举行暴动”，可见，第二次会议又必是二十八日以前。
再，李立三提到这次会议对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争论很大，
直至会议“第二日，恩来自汉赶到”才决定。可见，这次会
议又是在恩来到九江之前即开了；上限呢？根据李立三报

告，他还在庐山，得到“中、平、代电召返浔参加第二次会议时，就已知谭平山探贺龙之意见”了，而贺龙是二十三日到九江的，即使当天谭贺龙就见了面，那末，李立山返浔的日期，也就是第二次九江会议之日期，不能早于二十三日，而必是二十三日以后。基此，第二次九江会议，是在二十三日

日到二十七日之间举行的。

又据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说，恽代英是二十三日到九江的。李立三说，叫他从庐山返九江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代”，即代英，可见，这也说明第二次九江会议必是二十三日以后。

把第二次九江会议定在二十三至二十七日之间，准虽准，但幅度是五日，嫌太大，应力求确切些。惟不过材料不足，武断又不当，怎么办呢？还是提个“分析”意见和学者们磋商吧。我的分析，第二次九江会议是二十五日，在这之前，在庐山举行了两次会议。第一次有瞿秋白参加，似开在二十日到二十一日间；之后，秋白离浔返汉，第二次，即聂荣臻、张太雷等上庐山，李立三也在，已是二十二、三日以后了。代英二十三日到浔、贺龙也二十三日到浔，谭平山又探了贺龙意见，于是急召在庐山李立三等返浔，便于二十五日举行第二次九江会议，第二日，即七月二十六日，恩来自汉到浔（这是我们的分析）、九江会议才结束。

关于九江会议的参加人，第一次与第二次是不同的，第一次除叶挺报告中提到的五个人外，还可能有彭湃，瞿秋白似乎没有参加，如果他参加了，由于他身份较高，叶挺不会漏掉的。第二次九江会议参加人就多了恽代英（其余人材料不足）。第一次庐山会议的参加人，在没有更多材料情况下，按李立三的说法是九个人，其中只有聂荣臻似乎没有参

加。第二次庐山会议，则有聂荣臻而没有瞿秋白了。

关于九江会议的地点，目前材料不足，难以肯定，但根据笔者两次实地考察，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我也想提出个大概，即是在勃兰地教堂，或是二十四师师部——也就是叶挺的指挥部，今一七一医院。

分析的依据是这样：

当时在二十四师教导队学习的涂国林说，我们到九江的“当晚，部队宿于勃兰地教堂，第二天就编到二十四师教导队，移驻圣约翰中学”。

我曾问过他，你在勃兰地教堂或圣约翰中学住时，听说没听说你们的师部住在那里？听说过叶挺住在什么地方没有？他说，没有听说过。

在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工作过的黄序周说：

“……很快到了九江。我们驻在离城不远的—一个荒凉的地方。可能是住在一所中学里，好象是外国人办的，只记得周围都是荒地，但离城不远，我们经常晚上跑到江边茶楼、酒楼吃茶”（《黄序周回忆录》）

从黄序周这个说法看，他们很可能住在圣约翰中学。

关于圣约翰中学，九江博物馆曾开过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纪要》有这样一段话：

“经大家回忆，一致认定，圣约翰中学旧址，不是现在的二中四楼，而是一七一医院南院和北院的一部分。……”

一七一医院检验科主任曹植杰说，他是一九五〇年就到陆军医院工作的，当时就驻在北院进大门左边—栋两层楼房内。对面，有一家私人开业的小店铺，店内—张姓老头（传说任过九江伪公安局长），对曹主任说，“你住的房子有革命意义，它曾是‘铁军’叶挺部队的指挥部”。

后来，在调查访问一些老人时，有人听说过这个门口插过旗子。

我们还访问过曾在十一军政治部工作过的罗髻渔（即罗懋其）他说，在九江时似乎听说过在教堂里开过一个会。”

聂老总也曾说过，他从武汉到九江时，就住在叶挺那里。因为他要把中央关于要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通知部队，叫部队做好起义准备，一得中央命令，可以立即行动。再加上他和叶挺是莫斯科军事时的同学，所以，他到九江时住在叶挺的司令部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以上一些很不齐全的材料看，九江会议的会址，似乎有两个可能：一是勃兰地教堂，一是现在的一七一医院的北院。在这两个可能方面，我认为可能性更大的是一七一医院，因为这里有那个姓张的老头的见证。这个老头，据说曾当过九江的公安局长，那么，他对那里是叶挺指挥部应当是知道的。

勃兰地教堂，虽然也有几个人提到，但从涂国林的说法看，他曾在那里住过一夜，即使一夜，如当时叶挺就在那里住，一个战士会有很深的印象的。

从实地考察来看，一七一医院的二层楼，小房间较多，作为一个师部，加上从武汉来的干部很多，这里安排也较合适。

如果肯定这里是叶挺指挥部，而在这附近都住的是包括教导队在内的二十四师的部队的话，那末，九江会议就很有可能在这里召开。因为，当时情况紧张，斗争尖锐，党中央领导同志到这里时，自然都愿意住在自己的部队内，开会的地址，选在叶挺的指挥部里，当然也是比较安全和比较理想的。

就是这些，我分析可能性大是在这里，但仅就这些材料，是不够的，就此作结论，依据是不充足的。有待于发现新材料作结论。

九江会议，依我的分析，是两次；庐山会议也是两次。由于这几个会议相距时间近、内容一致，参加人大同小异。因而，关于会议内容，现在很难分得清哪个议题是在九江决定的？哪个议题又是在庐山决定的。所以，我把它们合在一起，叫做九江会议，或者叫做“九江、庐山会议”。

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说，要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是党中央在武汉做出的。决定的时间，笔者考证是七月十八日的会议。

但是，这个决定还是初步的，因而，就出现了九江、庐山会议。九江、庐山会议是武汉会议的继续。关于南昌起义发起的时间、部署及各种具体问题，都是九江、庐山会议决定的。正是由于有了九江、庐山会议，从而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实施阶段。所以说，九江、庐山会议，在南昌起义史上，是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的。也正基于此，九江会议和庐山会议两个会址，是应当把它辟为革命纪念圣地，以与南昌起义一起，永远被后人所怀念和瞻仰的。

小 船 会 议

在南昌起义光荣史上，占有另一光辉篇章的是“小船会议”。它虽然比较简短，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是同样不容忽视的。

小划子会议的由来。

“周逸群在一九二七年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

……二十三日，贺氏抵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适平山同志在浔，乃由平山介绍各省代表谒贺，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载《中央通讯》第七期）

这里所说的庐山会议，是汪精卫召集的。汪精卫预计在二十九日召集九江地区各军长和各总指挥到庐山开会，名义是研究东征问题，实质是别有用心。

李立三在报告中说：“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高唱拥汪，并对我不满，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时期。”

“这个极严重时期”，就是“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C、P、”了。

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张发奎日益右倾，“高唱拥汪”，庐山会议是个阴谋，是夺我兵权的一个险要计划。

小船会议就是在这种严重局势下召开的。

可是，敌人的这一阴谋，被在张发奎部下黄琪翔第四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知道了。剑英同志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还没有被汪精卫、张发奎等所怀疑。但是，剑英同志的一颗赤心是向着党的，而且，剑英同志往往是在历史的重大关头，表现了他的非凡气魄。

剑英同志获悉了庐山会议有可能对叶、贺下手的消息之后，就在汪精卫、张发奎未到庐山之前，及时地通知叶、贺。这就是小船会议的内容。

关于小船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人等问题，我们列举以下几则材料。

贺龙说：

“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